

DOI: 10.13504/j.cnki.issn1008-2700.2026.03.001

激发经济内生动力的 基本内涵、现实约束与实现路径

董志勇, 张荣杰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增强, 需要进一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通过持续激发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发挥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有鉴于此, 本文界定了经济内生动力的基本内涵, 探讨了当前阶段其面临的主要瓶颈。进一步地, 针对激发内生动力在制度、产业、内需和就业方面的现实约束, 提出了对应的路径选择。具体而言, 从发展阶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客观要求看, 激发经济系统的内生动力需要从制度建设、生产力跃升和产业体系现代化、坚持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高质量充分就业等方面协同发力。本文为更好地统筹经济发展和安全两大核心要义, 助力经济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关键词: 内生动力; 制度建设; 新质生产力; 扩大内需; 稳就业

中图分类号: F120.3;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700 (2026) 03-0003-12

一、问题提出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近年来, 党中央多次强调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2022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2025年,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围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新发展理念”“新质生产力”等一系列重要论述, 为经济发展的观念性变革与建设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前,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 “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 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在复杂外部冲击与国内结构性矛盾交织的现实背景下, 持续激发经济内生动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从基本内涵上看, 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是由制度安排、技术创新、产业体系、要素配置以及市场主体等共同作用形成的。它根植于整个社会经济系统, 是其内在的、多维的、能够持续自我强化和演进的核心力量之一。由此可见, 经济内生动力具备内在性、自主性、持续性等关键特征。它深刻影响着经济增长质量与结构, 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 激发经济内生动力并非单方面强调增长速度, 而是通过强化稳增长的动力源泉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使得经济保持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适

收稿日期: 2026-04-03; 修回日期: 2026-04-21

作者简介: 董志勇,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荣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通信作者。

度增长,通过二者相互作用、协同演进,共同指向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要义并构成其内在支撑。因此,强化内生动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战略选择。

二、激发经济内生动力的理论分析

激发经济内生动力并非简单地提高增长速度,而是通过自我演化和驱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上述过程主要通过四个方面的力量协同作用。其一,市场引导力。通过制度建设形成对微观市场主体的约束和激励,稳定预期。特别是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降低社会经济非理性波动,增强经济的内生动能。其二,创新驱动。通过新质生产力引领实现创新驱动,促进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形成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壮大实体经济。其三,内需牵引力。通过扩大内需对冲外需波动的影响,发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强化经济发展中国内大循环的主导作用,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其四,民生保障力。通过高质量充分就业,提升微观个体收入水平和抗风险能力,使得总体经济社会运行具备较强的修复和抗冲击能力,夯实社会韧性。进一步,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会通过完善制度建设、催生新质生产力、扩大内需和提升就业来增强经济内生动力。经济内生动力与发展水平形成正向反馈循环,共同作用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 制度建设是形成有效激励与稳定预期的基础保障

制度是保障社会经济运行稳定的重要基础,制度建设通过建立相应规则体系,发挥其对微观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保护和激励功能。制度建设是持续激发经济内生动力的重要来源,通过优化制度供给能够使经济更具适应性,增强其发展韧性。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要求,更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遵循。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要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通过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协同推进,助力早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这意味着制度建设只有进行时,需要将其置于动态、系统的视角中,始终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制度建设问题。制度本身是不断演进、发展和完善的,将其与深化改革的其他方面有机结合,才能够为优化社会经济运行提供系统化、法治化的规则框架,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方面,制度建设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等多个维度,科学完备、运转有效的制度体系能够为市场提供稳定的预期,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坚持制度建设的系统集成和人民导向,能够降低治理成本,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强化社会经济运行的宏观支撑。

(二) 现代化产业体系跃升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现代化产业体系既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是推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产业体系建设的理论认识和实践布局不断深化。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基本概念。2023年第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明确强调,要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可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体系建设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具体要求。

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支撑。近年来,中央一系列重要工作会议和文件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指明方向。在此背景下,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有助于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新

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从理论逻辑、结构特征和前进方向上看,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科学内核高度一致,前者是动力形态,决定后者的生成逻辑,后者则是结构形态,体现前者的实现路径。

(三) 持续扩大内需是稳增长的动力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发挥内需对提振经济的关键作用,借助超大规模市场畅通再生产过程中的消费、生产、分配、交换四个环节,能够有效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随着国内大循环主导的新发展格局有序构建,内需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度持续上升,其在经济驱动因素中对出口和投资的替代作用显著增强。就现阶段而言,庞大且稳定的国内消费市场可以起到“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熨平外部经济波动的影响,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这个角度看,发挥好内需的关键作用,其内在逻辑是通过国内大循环形成自我强化的增长螺旋,使得经济发展从依赖外需和投资驱动为主转向依靠内需和创新驱动为主,进而实现增长动力的根本性转换。这种转换通过增长动力更替,增强了经济内生动力的自主性和持续性。

(四) 就业是经济发展提质增量的民生底座

就业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稳定就业有利于保障居民收入,为扩大内需奠定基础,形成“就业、收入、消费”的良性循环。这对于拉动消费、稳定生产、稳定市场预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稳定就业本身对于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具有推动作用。另外,从统一大市场建设角度看,稳就业是保障超大规模市场有效需求的前提,有利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平滑外需冲击的不利影响。总之,稳定就业是增强经济系统抗冲击能力、实现自我修复和持续增长的核心环节。保障高质量充分就业,能够加快形成具有持续就业吸纳能力的劳动力市场,进而发挥对冲风险、扩大内需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

三、激发经济内生动力的现实约束

从经济内生动力的形成机制看,其面临的现实约束并非孤立存在。当前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制度建设、产业支撑、内需拉动和稳定就业四个方面。它们分别构成提升经济内生动力的基础性、结构性、现实性和反馈性约束。这些约束呈现出由制度供给到产业支撑、由需求不足到就业承压的传导关系,共同作用于经济内生动力生成与增强的全过程。

(一) 制度供给质量与治理效能的约束

制度供给构成基础性约束,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主体预期,当前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不足:

第一,制度建设缺乏系统集成。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看,提升经济内生动力必须全国一盘棋,真正建立竞争有序的国内统一大市场。但是,市场分割长期存在,其根源在于制度壁垒导致的交易成本高企。其中,制度性摩擦是推高市场运行交易成本的主要原因之一。这里面既涉及纵向上的央地衔接不畅导致政策传导与执行标尺不一、落地效果参差不齐,也表现为横向上的跨领域协作不足、区域间制度标准各异。一方面,制度体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部分制度缺乏从单一领域到跨领域的统筹考虑。另一方面,有些地区出于横向竞争的目的,会选择性执行相关制度,加剧了制度的碎片化、差异化。

第二,重制度建设轻制度落实。一些政府部门持续做大制度建设的增量,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做优其质量。制度体系过于繁杂,客观上导致一些制度执行力不强,运行机制不畅,实际执行和落实不到位,甚至表现为个别制度存在虚设现象。例如,数字政府建设相关制度规范较为明确,但实际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打折扣现象,政务数字化水平低、业务项目少,平台功能与应用流于形式,没有真正

与数字经济发展协同,使得政务服务满意度和基层群众获得感较差。上述问题导致制度建设“有形”但治理效能“不足”。这反映出如果政府监督落实到位,制度优势就很难充分转化为政府治理效能,进而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制度创新相对滞后。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影响,制度建设适应性不足,往往表现为问题频发而制度建设滞后,相关制度的缺位导致市场失序。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的制度仍不健全,民生领域制度供给不足,这种供需失衡造成一定程度的制度空白,未能充分释放改革发展红利,削弱了改革在改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逢漏补漏”的功能居多,而创新性制度较少。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如何逐步消除收入分配领域潜在的不公平、如何进行数据确权 and 定价、如何完善数据要素市场的制度保障、如何促进平台经济治理等一系列问题都亟待制度创新和落实。

(二) 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撑偏弱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经济内生动力转化为可持续增长能力的重要载体,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其支撑能力不足形成结构性约束。目前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面临以下四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科技创新能力与高端人才支撑不足。当前,现代化产业体系日益呈现出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发展趋势。我国虽拥有体系完备、门类齐全的产业基础,但“全而不精”的问题依然突出,尤其在创新能力和关键技术方面存在短板,制约着产业向现代化全面升级。

二是产业链的风险敞口仍然较大。产业链的风险具体包括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其中,前者主要表现为自身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产业链波动,比如新旧动能转换带来的地区间产业重构。后者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长期处于中低端位置所面临的高科技领域技术“卡脖子”风险。其二,外资国别结构失衡及其引致的产业链集中度偏高风险^[2];其三,地缘政治和贸易争端导致的供应链重构带来的产业链中断风险。目前看来,产业链外部风险占据主导地位,并直接影响国家社会经济安全。

三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现代化产业培育存在内在堵点,新旧动能转换节奏有待理顺。原因在于,二者在产业发展阶段、技术路径选择和要素集聚方向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更多意味着“优化存量”,关注对传统技术的改造升级和渐进式创新;另一方面,现代化产业更多是以新业态、新技术驱动的产业跃迁,强调产业发展“做强增量”以及技术的颠覆式创新。上述发展逻辑上的差异,意味着在有限的资源约束条件下,地方政府需要在两者之间统筹权衡。传统产业占比较高的地区,受路径依赖和稳增长需求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在资源配置上往往更侧重存量调整,导致产业总体现代化水平相对滞后,进而产生全局性影响。

四是产业发展的空间不协同问题突出。这一问题内嵌于国内市场分割,特别是地方主导的产业政策。简而言之,长期以来赶超型的增长战略下的“为增长而竞争”模式是导致该问题的重要原因。这种空间不协同体现在产业同构、要素流动受限、基础设施不衔接等方面,在地区之间或区域内部产业分工不合理、要素流动受阻、政策相互掣肘,未能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有机整体,进而制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三) 需求侧内生动力偏弱,经济内循环动能有待增强

内生动能不足构成激发经济内生动力的现实性约束,是制约当前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当前提升内需面临着短期承压与长期转型的结构性矛盾。具体而言,在发展战略上需要依靠消费,将提升内需作为稳定经济的主引擎的关键动能,但实际上面临着消费信心不足、消费刺激政策的长效作用有限、消费结构正在转型等多重挑战。

客观上,通过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参考钱学锋和裴婷^[3]的研究,可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外)需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率及内需结构的变化情况。图1显示,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中,消费已经成为主引擎。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投资于物的政策空间和总体作用缩小和降低,依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型增长难以持续。另一方面,近年来地缘冲突和贸易争端加剧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使得出口驱动的增长面临较高风险,

其对经济动能的贡献份额显著下降。基于上述背景,立足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发挥消费内需对经济增长稳定锚的作用愈发重要。但拉动消费内需面临着多重挑战,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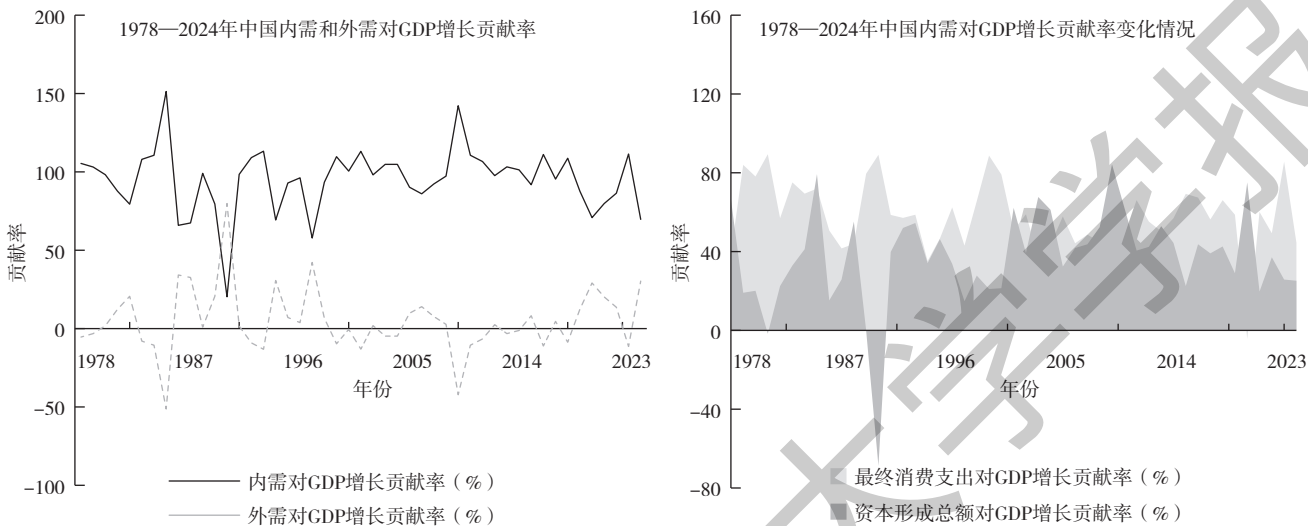


图1 1978—2024年中国内(外)需对GDP增长贡献率及内需结构变化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第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导致整体消费信心降低。从2019—2025年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变化情况看,总体上消费者信心指数呈现下行趋势,不管是当期满意指数还是未来预期指数整体均明显下降^①。从长期来看,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各级政府尽管采取了大量消费刺激政策,但并未改变消费者对总体经济发展的预期,进而未能形成对长期内需的拉动效应。从储蓄率上看,虽然2013—2024年我国总体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但仍大于40%。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人均存款首次突破10万元,总储蓄率高达43.4%,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65.9%(显著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反映出居民高储蓄、低消费的特征,表明居民消费仍较为谨慎。

第二,短期消费刺激很难形成长期经济增长动力。虽然消费刺激政策在拉动短期消费需求方面具有显著效果,但从长期来看,微观市场主体对收入、经济发展的信心不足,会加剧其预防性储蓄动机。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补贴政策实际上是边际效益递减的,消费补贴更多的是促进个体消费需求的跨期配置^[4],这种短期的消费拉升效应并不能较好地转化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消费券发放可能具有挤出效应。因此,刺激消费需求不宜采取“大水漫灌”的方式,应该结合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将其根植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弥合消费的不平衡、不充分。特别是应当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采取“精准滴灌”的方式,形成针对性消费刺激,这样既能实现稳消费的政策目标,又能通过消费政策实现再分配调节,进而改善民生福祉。

第三,未来消费结构将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以服务消费为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扩大服务消费,释放其潜力。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以耐用品(如家电、汽车等)、半耐用品(如家纺、服饰等)以及非耐用品(如食品、饮料等)为主导的商品消费正逐步转向服务消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居民服务消费占消费支出的46.1%。因此,在挖掘传统商品消费潜力的同

^① “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编制,百分点科技集团提供支持的季度指数。该指数基于全国范围有代表性的大样本调查和大数据舆情分析,展示消费者对总体经济发展的满意程度(消费者总体信心)与对国家多个重要消费领域的满意程度和未来预期(消费者分类信心),进而反映和预测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和消费变化的趋势,实现跨地区、跨人口、跨时间的对比(<https://www.nsd.pku.edu.cn/xzyj/kyfb/zsfb/zgxfzxxzs/540744.htm>)。

时, 更要注重扩大服务消费, 尤其是随着人口老龄化, 培育和壮大医疗、家政、旅游和文娱等服务消费。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十四五”以来社会民生统计报告》数据显示, 第三产业就业吸纳能力显著增强。2024 年末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为 35 866 万人, 占全国就业人员的比重为 48.8%, 其就业“蓄水池”作用愈发凸显。

(四) 失业风险放大使得高质量充分就业面临挑战

失业风险是反馈性约束, 就业压力上升对居民收入与消费形成冲击, 进而制约经济内生动力提升。理论上, 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快速重塑。一方面, 面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阵痛”, 遭受地缘风险和贸易争端导致的劳动需求不利冲击; 另一方面,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革命进一步加剧了就业替代风险。总体而言, 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起点层、放大层与加速层三个层级, 具体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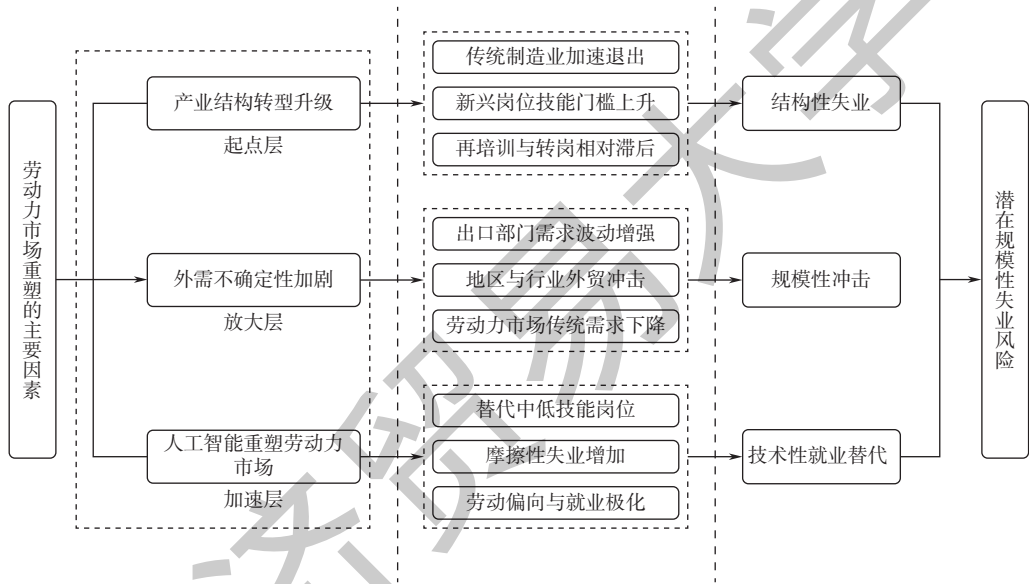


图 2 劳动力市场重塑与潜在规模性失业风险传导链路

其一, 随着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 增长动力的新旧动能转换可能导致结构性失业。长期以来, 我国有大量劳动力被电子设备、纺织品、玩具、建材、房地产等传统制造业吸纳, 参与重复性、标准化劳动生产中的各个环节。制造业绿色化、高端化转型, 特别是智能工业机器人的应用, 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力需求, 加剧了“就业极化”^[5]。传统的制造业、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升级迭代, 使得大量中低端制造业企业退出中国市场。而新兴制造业对劳动力需求的门槛高、岗位数量相对较少。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挤出的低技能劳动力离开原来的就业岗位, 甚至回流家乡 (这与近年来的流动人口返乡潮总体吻合)。上述过程使得劳动力市场出现供需失衡的结构性问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外部不确定性加剧与人工智能发展, 共同推升了中国潜在的规模性失业风险。与此同时, 这些因素通过就业极化、技能鸿沟和产业链重构等路径, 加剧结构性、摩擦性与技术性失业, 放大规模性失业风险。

其二, 地缘政治风险与对外贸易摩擦引致的外需变化对就业造成了冲击。中国周边部分国家陷入冲突, 加剧了地缘政治的紧张程度, 叠加中美贸易摩擦引起的关税制裁, 加剧了经济与贸易政策的双重不确定性。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较高的经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尤其是从 2017 年开始, 美国主导在经贸、科技等诸多领域对华“脱钩断链”, 客观上提升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成本, 大量中低端制造业不得不迁往海外, 例如印度、泰国以及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显著下降, 使得依靠出口导向的中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吸纳就业难以为继, 上述出口放缓与外需结构性变化对国内就业造成的

规模性冲击放大了潜在失业风险。

其三,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革新通过就业创造和就业替代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供需的结构性矛盾。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正深刻影响着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构^[6]。弗雷和奥斯本(Frey & Osborne)^[7]基于美国职业分类数据测算的职业计算机化概率(亦可视为职业的人工智能暴露程度),表明美国约47%就业岗位将暴露在高风险中。但是关于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与就业替代效应孰强还存在明显争议,一些证据表明其就业效应明显,能够带动企业创新^[8],另一些研究则指出人工智能对劳动或资本都具备偏向性替代作用^[9]。

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可能并非具有线性特征。如果高等教育对人才的培养无法与技术更新的周期协同,那么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普及将会加剧总体性失业风险。首先,从企业的雇佣形式上看,刘行等研究发现,人工智能的应用增加了企业灵活用工需求,减少了学历、工资较低和经验较少的全职员工的雇佣^[10]。此外,相较于工业经济时代对人体力劳动的替代而言,以人工智能引领的技术革命更多的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对人脑力劳动的替代^[11]。其次,从行业的暴露度风险上看,根据张丹丹等^[12]的研究,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技术暴露度较高的职业更多是学历较高、薪资较高的白领职业。结合该研究团队发布的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暴露指数,本文基于2018—2023年的动态暴露指数(美国《标准职业分类》(SOC)职业组别为Panel A和Panel B,智联招聘二级职业为Panel C和Panel D),分别绘制了最低和最高的十个行业面临的平均暴露度指数。图3显示,人工智能冲击对低端技术性行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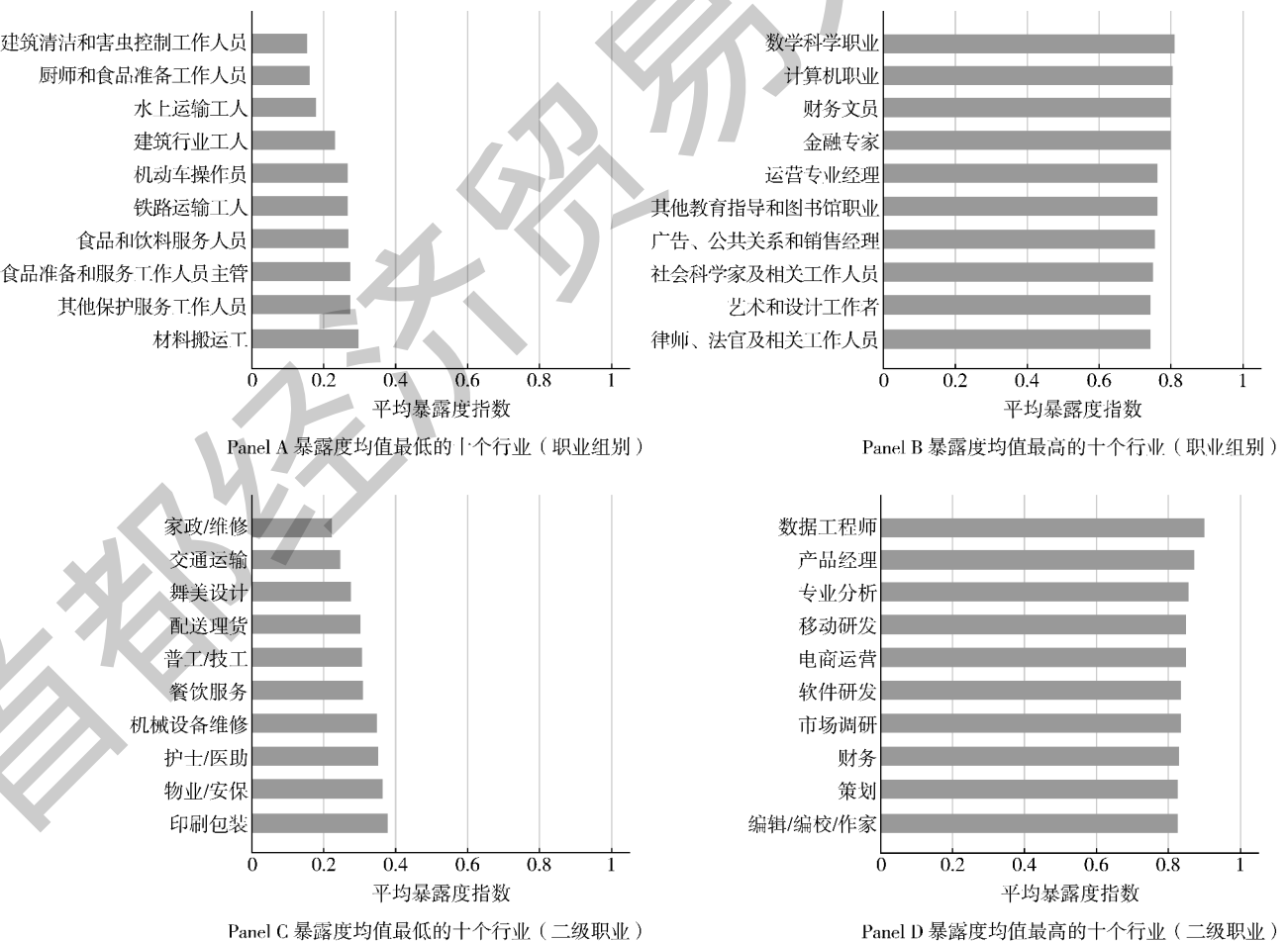


图3 “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技术”暴露度均值最低和最高的主要行业

注: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AI 与经济学实验室与智联招聘联合编制的中国“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技术”暴露指数。

影响较小,对计算机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白领行业影响较大。最后,从就业市场环境来看,自2022年起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超过千万,且远未达到峰值。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其就业创造效应转弱,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本身的供给和需求正在经历结构性变化,而人工智能加剧了就业市场竞争,提升了对白领行业的就业替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部分就业替代将直接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扩大应届毕业生的失业风险。综上所述,当前和未来,应着力防范和化解潜在的失业风险,稳定就业。

四、激发经济内生动力的路径选择

(一) 以制度建设为根本保障优化社会经济运行环境

目前,制度建设面临着制度统一性和协调性不足、制度供给与发展阶段不完全匹配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可以从以下维度完善制度建设。

第一,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制度建设。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身就要求创新要素配置,打破市场分割。研究表明,政府主导的市场整合有利于促进要素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13-16]。有鉴于此,一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要素价格的形成机制与配置方式。特别是除劳动、资本、土地以外,还要加快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健全标准体系,安全有序地扩大数据开放,通过“大数据+现代农业”“大数据+先进制造业”“大数据+高端服务业”,发挥数据要素对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赋能作用。例如,2022年成立的深圳数据交易所就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探索。二是统筹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在完善市场制度建设方面形成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局面。根据发展阶段和现实需要,明确有为政府相对的有限政策作用边界,让“看得见的手”更多发挥对市场经济的护航作用,破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卡点和堵点。通过健全市场规则与制度体系,形成充满活力、流动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气象。有效市场以有为政府为前提。政府通过规范市场秩序,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保障“看不见的手”对要素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

第二,完善科技创新的制度建设。解决关键领域“卡脖子”问题,需要在科技攻关、科研评价、协同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化制度改革。一方面,要破除人才发展体制机制障碍,为人才培育提供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列为“十五五”时期重要规划部署。这意味着,未来需要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优化调整,以便更加贴近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从政策实践看,高校拔尖人才培养计划能够有效强化理工科人才供给^[17],发挥科技人才的创新引领作用。另一方面,科技创新是激发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泉,要通过营造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的发展环境来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当前,科技创新的主体大致分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社会创新组织。单纯“重数量轻质量、重申请轻实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难以大幅提升创新质量,而深度融入产业发展的高校创新能够显著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质量^[18]。因此,需要进一步打破上述多元主体之间的壁垒,促进资金、人才、数据以及设施设备等在协同创新中有序流动和开放共享。

第三,优化产业政策与市场竞争协同的制度建设。新质生产力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先进生产力。提升经济内生动力既要减少政策性要素配置扭曲,又要通过政策监管规范市场竞争秩序。这意味着未来政策的价值取向要促进产业政策优化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有效协同。为了更好地促进二者有机统一,一方面要完善产业政策,从选择性产业政策主导向功能性产业政策主导转变^[19],推动相关政策从“挑选赢家”到“培育土壤”,从“直接干预”到“间接引导”过渡。通过制定和完善产业发展规划、提供财税优惠政策激励、推进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等具体举措,引导各类要素在企业、行业和产业间合理有序流动,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提供成长空间。另一方面,要完善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制度,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毫无疑问,技术变革正深刻影响着现行制度框架。传统的市场监管制度滞后于当前的市场竞争,特别是平台经济中的市场集中引发的垄断问题。不同于传统经济领域,对平台经济的有效监管已经超越传统的结构主义范式(市场份额)。因此,需要加强事前和事中监管,预防

并抑制不正当竞争行为,通过加快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二) 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并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为了更好地发挥新质生产力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引领作用,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

第一,以科技创新引领,构建更加自主独立的产业链体系。从产业形态上看,新质生产力是在“企业集合”意义上形成的新业态、新结构^[20]。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在深度融合中促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21]。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曾长期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位置,一些关键技术高度依赖海外市场。随着外部不确定性加剧,大国之间的产业链竞争持续增强,导致“断链风险”持续上升。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主导的技术封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产业现代化进程。因此,通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构建更加安全可靠的产业链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在大国战略竞争与人力资源供需失衡背景下,需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22],聚焦产业需求,加快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通过关键产品“揭榜挂帅”“卡脖子”技术集成攻坚等举措提升中国工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产业链的现代化。

第二,以绿色低碳为底色,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新能源汽车、5G、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实践看,中国正在逐步强化竞争性产业政策,通过政府协调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核心领域、“卡脖子”技术方面的关键性作用,实现产业并跑到领跑的重要转变。一是发挥绿色产业政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大量研究表明,绿色产业^[23]、绿色工厂^[24]、绿色金融^[25]等一揽子产业政策,有助于促进企业绿色转型。二是充分利用新技术推进产业数智化转型和融合化发展。新技术主要包括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先进制造、新材料和生命科学等关键技术领域。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新技术发挥着塑造产业形态和发展方式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产业由分工深化向融合发展演进,成为促进产业融合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支撑^[26]。因此,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构建以新能源、新材料等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

第三,推动产业政策范式转型,营造创新友好型制度环境。就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而言,关键不是讨论产业政策存与废的问题,而是怎样使得产业政策更有效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从产业政策上看,有为政府的政策边界条件在于摆脱单纯依靠选择性产业政策的一贯做法,通过全局协调,实现与新兴技术产业赶超的条件性相容^[27]。刘志彪认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两条政策路径正在走向融合互补,强化产业链已经成为主要国家的共同经济政策导向,围绕产业链政策正在形成新的路径^[28]。因此,未来产业政策的重点要实现从选择性到功能性与竞争性,从产业到产业链的系统性转变。推动这一转变,关键在于构建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要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要素合理有序流动;通过统筹发展和安全,稳定扩大开放的制度环境;通过夯实公平竞争的制度基础,实施更加审慎包容的监管。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安全与开放的关系,才能更好地确保产业政策的着力点向强化功能性和竞争性转变。最终,塑造一个能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充分激发市场活力的现代产业生态系统。

(三) 发挥消费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关键作用

一是通过稳定宏观经济基本面强化其对消费的支撑作用。长期消费的动力与信心有赖于稳固个体就业、市场预期与企业经营环境,通过稳定经济大盘,形成能消费、敢消费的良好循环。经济下行压力和外部环境变化本身就强化了微观市场主体的储蓄动机,因此要提升微观市场主体对长期经济发展和市场稳定的信心,做好预期管理。充分认识到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对于提振消费、畅通国内经济循环的重要作用。对此,要强化宏观调控政策有效协同,统筹财税与金融、产业等政策,降低政策的“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通过化解地方政府债务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托底经济。

二是利用数字经济放大短期消费的乘数效应,实现消费的提质扩容。政府部门应该采取因时制宜、

精准高效的消费补贴政策,提升消费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纵观2020年以来我国消费刺激政策的演进历程,大致经历了以普遍刺激为主的“应急托底”到精准刺激重点行业,再到补贴型、结构性消费刺激的阶段性转变。短期消费刺激能有效拉动内需,其“乘数效应”在实践中得到了印证。例如,文旅消费券每补贴1元,平均可带动4.1~4.4元的总消费^[29];政府每投入1元消费补贴,就能撬动3.4~5.8元的新增消费^[30]。2026年以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为主的新一轮消费品以旧换新稳步开展,该政策充分利用线上线下两个渠道推进居民消费提质扩容,有助于惠民生和促消费。

三是以促进新型消费与消费结构升级破解消费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新型消费是数字技术驱动满足人们信息化、智能化、多维融合等服务需要的行为过程^[31]。不同于传统的商品消费,新型消费呈现出新的形态、渠道和业态特征。具体表现为:消费者越来越注重服务消费,通过数字平台完成交易,强调“参与感”和“情感价值”,衍生出“体验经济”“共享经济”“无人零售”等新业态。新型消费促进了消费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为主的结构性转变,依托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手段,满足人们多样化、个性化、定制化的消费需求,提升微观市场主体的消费意愿。此外,通过数字平台与物流网络,将线上与线下深度融合,做好下沉市场促消费工作,保障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有助于弥合“不能消费”的鸿沟。

(四) 协同推进防范规模性失业风险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基本前提是保障就业充分,发展目标是提升就业质量。因此,首先要防范规模性失业风险,保障稳就业,在此基础上通过缓解就业错配、优化就业结构等举措提升就业质量。就现阶段而言,如何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规模的合理增长,化解潜在失业风险更为紧迫。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通过财政税收优惠降低企业负担,实现就业的稳岗扩岗。已有研究表明留抵退税、稳岗补贴以及社保减负等举措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就业结构调整等渠道有效提升企业劳动需求^[32-34]。因此,仍需要通过政府政策性优惠对就业规模大、就业吸纳能力强的特定行业或产业形成“精准滴灌”,强化“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的链路循环。二是加强毕业生就业事前指导、事中跟进与事后监测。通过加强培训引导以及数字化技术应用等举措,提升岗位适配性和就业质量,解决人力资源供需结构失衡等问题。特别是利用大数据平台形成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全链路闭环,强化失业风险预警。三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稳固农民工、脱贫人口等重点群体就业。经济不确定性增强加剧了结构性失业,使得灵活就业群体规模日趋庞大,由于外卖、网约车及快递等灵活就业行业在稳就业中具有关键作用,因此需要重点完善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

五、结论与展望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要求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国经济具备制度、市场、产业体系和人才资源等多方面优势,在一系列改革和发展实践中展现出基础稳固、韧性较强的经济大国底色。在此背景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靠激发内生动力稳住基本盘,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速,又要靠提升发展韧性守住防控风险的底线,筑牢长期发展的安全屏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要求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本文立足内生动力视角,在阐述基本内涵与内在逻辑基础上,分析了当前面临的约束并围绕四个方面提出了可行路径。一是坚持深化改革,通过完善制度建设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稳定的预期,这是稳增长的关键支撑。二是促进生产力跃迁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实现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三是提振消费,强化内生增长的核心动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四是协同推进失业风险防控与高质量充分就业。既要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又要在高校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更加灵活,促进人力资源供需匹配。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上述四个方面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互为支撑、协同并进。打好政策“组合拳”,夯实制度基础,驱动创新引擎,释放内需潜力和

牢牢守住民生底线,才能更好地统筹安全与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参考文献:

- [1]刘英,陈运平.数字经济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作用机制及战略举措[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5,27(2):3-12.
- [2]倪红福,钟道诚,彭思仪.外资视角下的中国产业链风险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25(7):165-184.
- [3]钱学锋,裴婷.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逻辑与内生动力[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7(1):14-26.
- [4]XING J W, ZOU E Y, YIN Z T, et al. "Quick response" economic stimulus; the effect of small-value digital coupons on spending[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23, 15(4): 249-304.
- [5]王永钦,董雯.机器人的兴起如何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0,55(10):159-175.
- [6]宋一森,王成章,郑敏.人工智能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和影响[J].经济学家,2025(6):36-45.
- [7]FREY C B, OSBORNE M A.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 [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7, 114: 254-280.
- [8]尹志锋,曹爱家,郭家宝,等.基于专利数据的人工智能就业效应研究——来自中关村企业的微观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23(5):137-154.
- [9]郭凯明.人工智能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J].管理世界,2019,35(7):60-77.
- [10]刘行,张昊天,田轩.人工智能、人力资本结构与灵活用工——来自在线招聘大数据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25,60(7):240-260.
- [11]郭凯明,王钰冰,龚六堂.劳动供给转变、有为政府作用与人工智能时代开启[J].管理世界,2023,39(6):1-21.
- [12]张丹丹,于航,李力行,等.中国人工智能技术暴露度的测算及其对劳动需求的影响——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新证据[J].管理世界,2025,41(7):59-75.
- [13]倪婷婷,王跃堂.区域行政整合、要素市场化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39(11):136-156.
- [14]夏杰长,刘诚.行政体制改革、要素市场化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43(11):3-13.
- [15]WEI X, XU J, ZHANG Q H. 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 evidence from border adjustments in China[Z]. SSRN No. 4463716, 2023.
- [16]HAN Y, WU M Q. Inter-regional barriers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4, 167: 103197.
- [17]宋弘,陆毅.如何有效增加理工科领域人才供给?——来自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20,55(2):52-67.
- [18]亢延锬,郭家宝,胡志安,等.创新驱动、激励机制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以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例[J].管理世界,2025,41(3):50-76.
- [19]江飞涛,李晓萍.直接干预市场与限制竞争:中国产业政策的取向与根本缺陷[J].中国工业经济,2010(9):26-36.
- [20]高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3,14(6):127-145.
- [21]洪银兴.新质生产力及其培育和发展[J].经济学动态,2024(1):3-11.
- [22]张建清,张星民,伍骏骞.大国战略竞争下的新质人才需求:来自大模型数据挖掘的证据[J].世界经济,2025,48(9):117-145.
- [23]毛其淋,石步超.通向绿色发展之路:智能制造与企业绿色转型[J].世界经济,2024,47(9):152-182.
- [24]戴魁早,王思曼,黄姿.绿色工厂建设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吗? [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41(11):177-199.
- [25]李俊成,彭俞超,王文蔚.绿色信贷政策能否促进绿色企业发展?——基于风险承担的视角[J].金融研究,2023(3):112-130.
- [26]潘珊,李剑培,顾乃华.人工智能、产业融合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J].中国工业经济,2025(2):23-41.
- [27]贺俊.新兴技术产业赶超中的政府作用:产业政策研究的新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22(11):105-124.
- [28]刘志彪.产业链政策:中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践的新趋势[J].中国社会科学,2024(6):12-18.
- [29]胡羽珊,张鹏龙,郑新业.中国消费券发放的多维经济效应——基于居民文旅消费微观数据的估计[J].经济研究,2025,60(9):89-111.
- [30]LIU Q, SHEN Q W, LI Z H, et al. Stimulating consumption at low budget: evidence from a large-scale policy experiment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J]. *Management Science*, 2021, 67(12): 7291-7307.
- [31]毛中根,谢迟,叶胥.新时代中国新消费:理论内涵、发展特点与政策取向[J].经济学家,2020(9):64-74.
- [32]崔小勇,蔡昉珊,卢国军.增值税留抵退税能否促进企业吸纳就业?——来自2019年试行留抵退税制度的证据[J].管理世界,2023,39(9):15-38.
- [33]刘贯春,吴佳其,叶永卫,等.稳岗补贴、流动性约束与企业劳动力雇佣[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41(8):71-92.
- [34]徐舒,魏文博,王茹.企业社保减负的就业结构优化与居民消费提振效应[J].管理世界,2024,40(7):121-144.

Basic Connotations, Realistic Constraints, and Realization Paths for Stimulating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of the Economy

DONG Zhiyong, ZHANG Rongji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Achieving stable economic growth and preventing systemic risks are crucial for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imulat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within the economy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basic connotations, realistic constraints, and realization paths for stimulating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study identifies four important sources of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and discusses the key roles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th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domestic demand, and stable employment in stimulating these forc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alistic constraints underlying the current insufficiency of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including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upport, domestic demand expansion, and stable employment, which constitute fundamental, structural, practical, and feedback constraints, respectively. This study argues that: (1) The lack of systemic integration in institutions,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implementation, and inadequate innovation prevent the full transformation of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into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2) In th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deficiencies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talent support, high exposure of industrial chain risks,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spatial incoordination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undermine the supportive role of the industrial system for economic growth. (3) Domestic demand is constrained by three factors: weak consumer confidence, limited effectiveness of short-term stimulus polic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4)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creasing external demand uncertainty, and th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ies represen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intensified the potential risk of large-scale unemployment in China.

Addressing the above major aspects,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following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 it should improv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by promoting the marketiz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encourag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nsur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market competition. Second, it should strengthen th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by fost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leveraging the rol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eadership,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paradigm renewal of industrial policies in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ystem. Third, it should expand domestic demand, use the digital economy stimulate consumption in a targeted manner, and promote new types of consump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to meet diverse consumer needs. Fourth, it should ensure stable employment and improve employment quality through reducing the burden on enterprises, addressing employment mismatches, and mitigating unemployment risks.

Keywords: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stabilizing employment

(编校: 王 轶; 姚望春)